

宫崎市定及其史学研究中的东西交通视野

——写在《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文版出版之际

张学锋

1922 年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的宫崎市定，不仅继承了内藤湖南扎实的中国史学功底及中国史分期学说，更受到了桑原鹭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东洋史学及世界史学这一广阔视野的熏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史、中亚西亚史、日本史及欧洲史。宫崎广阔的史学视野表现在其几乎所有的著作之中，而基于东西交通史的立场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及所谓“东西交通视野”的运用和实践，主要集中在收入《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的各篇（种）中。



宫崎市定及冠以作者姓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宫崎市定（1901—1995 年）是 20 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其研究领域之广，是同时代学者无可企及的。关于其生平及研究历程的中文介绍，可见韩昇教授贤伉俪《九品官人法研究》中译本前言《宫崎市定和〈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华书局，2008 年）。同时，韩昇教授贤伉俪还编译了《宫崎市定著作年表》，附于《九品官人法研究》中译本之后，为我们全面了解宫崎市定的史学成就提供了完整的信息。

宫崎市定一生著作等身，《宫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1991—1994 年）共计 25 卷，按专题收录了他一生的大部分著作。宫崎市定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其实很早，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 60 年代前期，陆续出版了刘永新、韩润棠译《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1962 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1963 年）和《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1965 年）。前者是宫崎市定 1940 年出版的单行本；后者是翻译组选译的宫崎市定论文及书序，两卷共计 26 篇。但以上两种译著均为“内部读物”，且当时对宫崎市定的定位是“反动透顶的‘东洋史学家’”，翻译其著作的目的也在于“剥开他的‘画皮’”（《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前言），因此两种译著的出版，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似乎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可以想见，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那种极度贫困的年代，历史研究的核心部门组织人力翻译宫崎市定的论

著，供研究人员参考，其目的绝不是为了剥开这位“反动透顶”的学者的“画皮”那么简单。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借鉴和利用国外研究成果的风气也日盛一日。刘俊文教授组织翻译了 10 卷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 年），其中收录了宫崎市定的代表性论文 8 篇。此后的译著，据笔者管见则有前述韩昇教授贤伉俪所译的单行本《九品官人法研究》和孙晓莹译《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这次翻译出版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原著于 1976 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说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看到该书的上卷《前言》第一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据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本书中译本《序》作者砺波护先生介绍，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

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 10 年以后的事，因此希望能将已经绝版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于是就有了冠以作者姓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市定的姓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

收入《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的小型单行本和论文共计 46 篇（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下两册及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各卷已译出的篇目计有 11 篇（种），加上刘永新、韩润棠译《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和孙晓莹译《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共计 13 篇（种）。考虑到时代和语境的变迁，并力求译文的准确性，上述既有的 13 篇（种）中译本，在本次译著时没有就此录入，而是重新进行

了翻译。

二

关于《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原著的编辑出版，宫崎本人在各卷的《前言》和下卷最后的《跋》中已经写得比较清楚。当初促成《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出版发行的“接生婆”之一（《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下卷《跋》）的砺波护先生，特地为这次该书中译本的出版撰写了序言，对该著的编集过程及学术成就做出了详细说明。

以京都大学为舞台的日本东洋史研究会，在第一代会长羽田亨（1882—1955 年）逝世后，宫崎成为第二代会长。在继续编辑发行学术季刊《东洋史研究》外，宫崎还积极组织编辑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系列丛书，丛书的第一种就是宫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东洋史学会，1956 年）。次年，宫崎开始集结出版自己的四卷本论文集《亚洲史研究》，第一卷首

先收录了他 1940 年以前发表的早期论文。宫崎在集结自己单行以外的学术论文时，将论文集命名为《亚洲史研究》，可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意识鲜明地与传统的“东洋史学”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亚洲史研究》第一卷《绪言》的最后，宫崎这样写道：

本书名为《亚洲史研究》，但对现时的我而言，仍是一个力难所及的题目，因为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的所有地区，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但是，按我长期以来主张，“亚洲史”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不够完整的标题。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希望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解。

这是宫崎的真实想法。1959 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二卷收录了其 1944 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3 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三卷收录了其 1950 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4 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四卷收录了其 1955 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十余年后出版发行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说编收录了其已经绝版的单行本六种，而中、下卷中则按时代先后集结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中未收录的 1956 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

在《亚洲史研究》刊行之际，曾经的京都大学同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泰斗吉川幸次郎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